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H·钱纳里
S·鲁宾逊
M·赛尔奎因著
• 吴奇 王松宝等译
• 陶文达 徐宽校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

(沪)新登字101号

H. Chenery S. Robinson M. Syrqu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 1986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周瑶明

装帧设计 宋珍妮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H. 钱纳里等著

吴奇等译

陶文达等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编 200020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中华印刷厂印刷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363 000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987-8/F·413

定价: 22.70 元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主要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经济顾问霍利斯·B·钱纳里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他于1918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195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年获荷兰经济学院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教授，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世界银行副行长等职务，1965年起曾多次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至今。他还是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会员、委员会委员，美国文理研究院研究员。

钱纳里长期从事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具有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丰富经验，因而造诣较深。他的主要著作有：《产业联系经济学》（与P·克拉克合著）（1959）、《工业化进程》（1969）、《发展计划研究》（1971）、

《伴随增长的再分配：政策探讨》(与他人合著)(1974)、《发展型式，1950—1970》(与 M·赛尔奎因合著)(1975)、《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1979)、《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与 S·鲁宾逊和 M·赛尔奎因等人合著)(1986)等书。

钱纳里对经济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50年代，钱纳里最先运用影子价格理论进行了投资项目的分析，从而发展了微观计划理论。他还在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推进了有关产业之间联系的理论研究。60年代，钱纳里同布鲁诺(Bruno)和斯特劳特(Strout)等人一同提出了两缺口模型，将投资、储蓄和进出口同引进外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分析模型至今仍为国际经济理论界、各种国际机构和各国的计划部门广泛采用，作为分析国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有用工具。

当然，最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熟知的还是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发展型式”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著作是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型式，1950—1970》一书。该书吸取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书中运用130个变量的20000个观察值，分析比较了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这种结构变化不仅包括生

产、需求、贸易、资源使用和人口等方面的结构变化，而且包括城市化和收入分配等过程的变动。钱纳里和赛尔奎因认为，投资和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发展而言，重要的是需进行全面的结构转变。与此相关，他们强调应对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因素展开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以及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和国际贸易环境等等。在对结构转变和影响结构转变的各种因素的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基础上，他们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平均）型式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发展型式”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独树一帜。这一理论和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影响了我国一代经济学家。1984年，在世界银行考察团的启发下，我国不少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吸取和借鉴钱纳里等人的“发展型式”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此外，70年代钱纳里还就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发展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

2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是钱纳里

同S·鲁宾逊和M·赛尔奎因等人80年代合作研究的新成果。钱纳里等作者在这本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发展型式”的理论、思想和方法。

该书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通过多种形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以工业化为主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准工业国家(地区)的发展经历。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结构转变的基本特征和工业化的各个方面，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贸易政策和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等三种不同的工业化型式，并评价了它们的优劣之处。该书的主要论点(和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析比较战后准工业国家(地区)工业化的发展经验和工业化的原因，须综合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等诸种分析工具。作者认为，只有将多种模型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才能比较各国的发展经验和各种政策实施的效果。为此目的，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综合概括了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准工业国家(地区)的投入—产出帐户和多部门分析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本书统一的核算体系和分析方法。本书特有的分

析体系和方法，为较大样本的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二，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这不仅表现为，不同收入水平上，经济结构的状况不同；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等）的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这里，作者强调指出：（1）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2）结构转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各阶段，不同部门、不同要素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同；（3）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结构关系不同；（4）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为重要，即，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再配置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构变化的余地也更大；（5）一些新兴工业国家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结构转变以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利用，是它们经济增长加速的两个主要原因；（6）以竞争均衡为假设条件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时，必须加以重大的修正。

第三，工业化是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阶段，同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这样的供给因素变化相

比较，需求因素变化对于工业化的作用同样重要。可以说，工业化即是以各种不同的要素供给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一种途径。但是，作者认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供给因素的变化，因此，必须加强对需求因素的研究。从需求方面展开分析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研究支点。

第四，工业化——经济结构的转变取决于两类主要因素的演化：总需求的水平和要素供给的结构。通过多国模型的综合分析，可以揭示工业化、或者说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这里，作者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1) 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间需求而不是国内最终需求的变动，因而，必须对工业化主要源于恩格尔效应的公认观点加以重大的修正；(2) 贸易型式的变化，比起国内最终需求的变化来，对总产出中制造业份额增加的影响也更大；(3) 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影响工业化的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

第五，揭示工业化的标准型式，只是概括大样本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发展的共性)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需揭示各国发展经验同标准发展型式之间的区别，以把握发展政策同发展实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与工业化的初始条件(资源禀赋和人口规模)相联系的贸易

战略和政策的区别，是各国的结构转变和工业化所处阶段之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各国影响结构转化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所区别的主要原因，即，由于各国贸易战略和政策上的差异，各国的结构转变呈现出不同于标准型式的多样性来。

第六，根据发展战略、特别是贸易战略和政策的区别，可以将准工业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大致划分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3种主要型式。这3种型式的划分可以揭示准工业国家(地区)发展经验的主要区别，并说明政策、结构和发展实绩之间的联系。这里，作者着重指出：(1) 发展战略和增长因素密切相关，即，越开放的经济，效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越大；(2) 初始结构和发展战略对工业化过程的时间选择和特定经济活动发生顺序的影响，超过其对总的结构转变类型的影响；(3) 实行不同发展战略的国家，结构转变的时间、顺序不同，速度不同，各部门、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制成品出口导向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较快，国内外产业联系的程度较高，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也较大。

第七，一个国家可能选择的发展战略，以及某种战略可能产生的结果，取决于国际、国内各种制约因素的作用。作者认为：(1) 一国的发展战略由其政策选择和其制度环境决定，同时

也受外部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和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2) 在不同的初始条件、制度环境和世界经济状况下，同一种战略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3) 内向型(进口替代)战略和外向型(出口导向)战略之间具有有机联系，具体表现为：一国在世界市场上能够成功地进行竞争、从而转向出口导向或外向型战略之前，需要有一个进口替代和深化投入—产出关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发展国内的工业基础；(4) 内向型战略向外向型战略转变，还有赖于外汇和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在当代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书中运用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书中提出的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转变的思想，以及书中对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发展战略和政策所作的详尽而深入的分析，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产生重要的启发，也将为我国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有益的历史经验。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该书的理论和方法已尽善尽美，我们还需批判地加以借鉴和吸收。

本书的另外两位主要作者，S·鲁宾逊和M·赛尔奎因，分别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也都是世界

银行的经济顾问。

3

本书前言、第1、2、3、4章由吴奇译出；第5、6章由王松宝译出；第7、8章由伍云长译出；第9、10章由潘佐红、郑雄伟译出，第11、12章由卢锋、苏晓红译出。此外，吴奇通阅了全书，统一了译名，并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

为了便于读者查找文献和对照译名，我们在书末附有英文原书的参考文献和英汉人名对照表。

陶文达教授和徐宽同志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们校对了译稿。陈昕、周其仁、卫飒英、周瑶明等同志十分关心本书的翻译工作，并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吴 奇

1988年6月



中文版前言

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本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的各种工业化发展的新类型，范围自南朝鲜和台湾的出口导向增长类型到哥伦比亚和土耳其的较为内向的增长类型。

为什么各国都要实现工业化？有些因素，诸如需求和技术的变化，是所有国家共有的。还有一些因素，如资源禀赋和发展政策，则各国都不一样。为了研究二次大战后 9 个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以探求实现工业化的要素和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了统一的分析框架，这就使我们得以确定三种主要的工业化类型，并阐明这些类型的政策含义。

本书的主要问题在于将所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地区）共有的因素同那些随政策选择而异的因

素分离开来。这个做法揭示了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同的影响，并将重点放到导致工业化过程中所有国家(地区)普遍存在的各部门间平衡的力量上。霍利斯·钱纳里是前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谢尔曼·鲁宾逊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教授。摩西·赛尔奎因是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们都是世界银行的顾问。

霍利斯·钱纳里

1988年7月12日



原版前言

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库兹涅茨 (1966)* 在他的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中，将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确定为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工业化和收入水平增长有着很高的相关关系，同时，由于资源禀赋和政府政策的不同，发展也会形成重大差异。

有争议的是：这些关系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工业化的根源十分广泛，从调整供给结构以适应国内需求变动的需要，到利用各种劳动密集活动的比较优势。过去 10 年中，这种历史趋势得到了调整，原因是一些国家加速实现工业化以弥补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与此同时，一些有利可图的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却受到“荷兰病”和非工业化倾向的损

* 括号内的数字（和字母）表示所引著作的年代（和该年的第几部著作），这些著作的名称可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中查到，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译者注。

害。在设计发展政策时，有必要对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化的长期趋势，以及同这种趋势相背离的各种偏差进行评价。

本书是世界银行赞助的关于结构转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之一。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75、1980)将库兹涅茨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低收入国家，他们考察了战后低收入国家的各种发展类型，并且提出了一种对不同国家工业化原因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后，德维斯、德梅洛和鲁宾逊(1982)运用一般均衡理论，又提出了一种用途更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这使他们得以比较不同政策实施的效果。本书试图将这两种分析线索结合起来，以说明战后准工业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

本书的研究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这是为了利用日益增多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地区)生产结构的各种资料。①第一阶段的中心工作是，在一个易于对不同时期的国家进行比较的理论框架内，为9个准工业国家(地区)建立一套可比投入—产出帐户。这一阶段推出了一系列有关单个国家(地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出版物。

我们第二阶段研究的重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明显区别、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的影响以及部门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背景下，对日本、南朝鲜、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等4个国家进行了较为深入